

# 抗戰中的浙大女生

謝思蓀

中外雜誌的「讀書生活回憶」專欄，以前各期已刊出勞幹、魯傳鼎諸先生之大作多篇，引起海內外讀者重視，佳評如潮，本期特請旅美之謝思蓀女士撰「抗戰中的浙大女生」一文，亦莊亦諧，感人至深。為本刊此一專欄一系列作品之一。

編者

## 千山萬水到播州

抗戰期間，我在國立浙江大學唸書。提起浙大，似乎會使人聯想起美麗的西子湖，那山清水秀，錦繡天堂的魚米之鄉，然而，浙大却是在艱苦抗戰之中，幾經播遷，而至成熟。她不僅是全國幾有名的學府之一，而且她聲譽卓著，傳誦遐邇，至今人們一提到她的名字，都還在低迴懷念，尤其是抗戰那幾年間，隨着漫天的砲火烽烟，浙大在各方面都放出奇葩異彩。英國李約瑟（Joseph Needham）訪華時，看到當時浙大師生的苦幹精神，和研究實況時，他曾說那是中國的劍橋。

浙大前身是求是書院和浙江高等學堂。書院成立於一八九七年，其後幾經變遷，到了一九二七年即民國十六年方始改為國立浙江大學，設文

理、工、農三院共十九系。

廿六年抗戰軍興，給浙大帶來了很多的苦難，其中經過五度播遷，一次轟炸，和一次大火。浙大從千災百難中長成，茁壯、堅固起來，像風雨中的一座燈塔，光芒四射到大海的四週。

廿六年冬天，杭州淪陷，浙大學生掀起一片抗戰浪潮，很多人都從軍去了，其後風聲日緊，浙大奉命西遷。一年級新生到西天目山，其餘遷到建德。幾個月後，又大夥兒由建德到江西吉安，誰知日寇緊逼，又由吉安到泰和。在泰和，安定了一個時期，但不久又被迫再度西遷，到了廣西宜山。在宜山，學校增添好些院系，擴大規模，同時在浙江龍泉設立浙東分校，至此以為可以稍事喘息，誰知宜山是個地瘠民貧之區，同學多營養不足，女同學更因缺乏碘質，有些人長了大頸子，吃了很多苦頭，同學間因而流傳了一句「宜山宜水不宜人」之謬。後來又不知怎的被日本人看中，對準浙大所在地的標營大肆轟炸，雖然損失不貲，但是全校師生幸無傷亡，反而有一位神經受了刺激的同學，因為關在房裏，沒能逃警報，經過了巨大的聲響和震動之後，反而神志清醒了。大家都稱這次大轟炸是受了一次「光榮的

洗禮」。

宜山一年多，又再度搬家，先是一年級設在貴州青岩，校本部和文、工、師範等學院遷遵義，農、理、及附中在湄潭。一年之後，一年級又搬到湄潭附近的永興場，至此便沒有再搬。總計由民國廿六年起至抗戰結束後一年止，一共大搬家五、六次，直到民國三十五年又才大夥兒陸續返回杭州。在抗戰期間播遷最多，遭殃最大的學校，恐怕要算浙江大學了。

## 淡掃蛾眉。水桶罩三圍

說到抗戰期中浙大學生的衣食住行，那真是笑話。時至今日，我常常想，當年我們沒有餓死，沒有凍死，沒有病死，真是奇蹟。

衣着方面，談不上時髦和質料，只要能有一件蔽體之物，那就是萬幸了。男同學平時多穿襯衣單褲，冬天有一件老棉袍在身，已可令人側目。女同學以藍布旗袍最為風行，長長的，寬寬的，像水桶一樣的罩住三圍。不過女同學比較便宜，她們能縫能補，所以捉襟見肘，（衣服袖子破了一個大洞，肘部露出心，空前絕後）（鞋襪前後都破了）的現象很少。但有些人情況也相當精彩，一

雙襪子穿了，一補再補，補到無處可補的時候，乾脆把襪底剪掉，換雙布底，這樣又可混些時候。不太會拿針線的，她們也有個辦法，把破襪子向前一拉，再反折過來，這樣就不會前喫後空了。但襪子會越穿越短，短到連小腿都遮不了的時候，那就丟掉。當時不但女同學會拿針線，有些男同學也會，無啥稀奇。

## 王婆罵街。蚤大娘告退

吃的方面，女同學也較便宜，遵義是女生自行開伙，湄潭、永興兩地男女同學合伙。飯，好像是够吃的，只是菜，少得可憐，永遠不够分配，食量大點的同學，到最後只有吃白飯。女同學吃東西比較斯文，大家客客氣氣，普通都心照不宣，實行「蜻蜓點水」和「逢六進一」制。菜勉强可以應付。所謂「蜻蜓點水」，就是夾菜時，不能大塊大塊的來，要像蜻蜓點水那樣着到即是，譬如吃豆腐乳，只能用筷頭粘一點點即可。所謂「逢六進一」，就是吃六口飯才進一口菜，六口飯分兩次下嚥，一長五短之後，才能吃菜，如此，有時還可以留下點殘湯剩水，等這桌女同學走後，往往會被男同學搶光的。至於男同學們一桌八人，如何能分配那兩盤小菜，情況真不可想像。話說一次一位男同學，實在熬不住，早餐吃油炸黃豆時，竟然膽敢「逢二進一」起來，結果惹得同桌某君大怒，索性將一碟黃豆往他面前一放，兩人為此大吵一架，幾乎動武。有位男同學曾經說過，他除了大葷死人不吃，小葷蒼蠅不吃之外，其餘什麼都吃，看到菜市場裏的豬肉，就

想上去咬牠一口，其情可憫！由此亦可見當時「民生」狀況。

浙大在黔北三地，除湄潭蓋了一些新宿舍外，遵義永興校地大都借住文廟、祠堂、和破落世家的房子，情況至為可笑。就像教室、實驗室等，有些教室的木板後面藏着怒目圓睜的神像，有些教室內有兩根柱子，宛似室內排球場。湄潭有兩間教室臨街，隔街住些蓬戶人家，有一次我們正在上課時，忽然對街人家兩個女人大吵大罵起來，當時天熱，門窗大開，我們被吵得不能上課，於是正在教課的劉老師在這邊吆喝着叫她們不要吵，可是人家在氣頭上，正吵得起勁，誰管你上課不上課？置之不理，後來實在吵不過，於是劉老師將頭伸到窗外，大聲吆喝着說：

「咳，你們兩個不許再吵，再吵我就叫憲兵來把你們抓起來。」

此語一出，兩人果然不吵了，大家一致槍口對外，聲勢洶洶，指手劃腳地對劉老師大罵起來，嚇得劉老師連忙縮回頭來將窗子關住，這一下弄得我們忍俊不住，立即我就打個紙條子，丟給我鄰座的一位同學，上面寫道：

「王婆娘罵街鬧學府，劉老師吆喝不值錢。」

這兩句話引得她手掩着嘴，大笑不已。宿舍也很好，為了節省空間，都是上下舖，木板床，木板桌子，勉強可以應付，只是當時最討厭的事，就是晚上有飛機、大砲、坦克來打擾。飛機即是蚊子，大砲是跳蚤，坦克是臭蟲，其中蚊子較易對付，一頂蚊帳可免遭殃，最討厭

的是臭蟲，無孔不入，除之不盡。最普遍的殺臭蟲方法是將床板拿出去晒或是燒開水燙，這樣可安靜好幾天，但過不了些時，將墊被一掀，床板上又有許多蠢蠢而動的臭傢伙了。有一年費羣先生接掌訓導長，他有三大德政，其中之一就是燒開水燙臭蟲，可見得臭蟲雖小為害很大，已經震撼學校當局。跳蚤也很討厭，此君身手敏捷，不像臭蟲僵瓜，很難捉到，當你睡到半夜感覺腿痒時，連忙坐起，已經什麼都不見了。我有一個朋友，是捉蚤能手，她可以左手拿油燈，右手打跳蚤，她一巴掌打到床上，手掌向後一拖，拿起來之後，姆指與中指之間，準有一個跳蚤，她一夜可捉十幾個，也常常替我們捉，後來我們都叫她蚤大娘，她氣得從此洗手不幹了。

說到行的方面，女同學最遭殃。遵義有新城老城之分，女生宿舍在老城，教室和圖書館在新城，實驗室又有部份在城外，一天來回奔波，非有百米競賽的本事是不能勝任的。最尷尬的是何家巷教室沒女廁所，寒冬臘月，早上三碗稀飯下肚之後，在那兒連上三堂課的人，莫不狼狽不堪。

湄潭更是有行路難之感，飯廳設在男生宿舍旁邊，由女生宿舍走去吃飯時，須翻個小山坡，走過羊腸小徑，穿過男生宿舍旁邊，才到飯廳。這一帶都是田野泥巴路，遇到陰雨連綿之際，路滑難行，一個不小心就會跌個兩脚朝天或雙手支地，衣服弄得又濕又泥，只得再回宿舍來。有些缺德鬼的男同學，每到這種天氣，就倚窗而立，憑欄遠眺，偶而有個女同學來個精彩表演，跌倒

泥漿裏時，他們就鼓掌歡呼，在房裏起哄大叫，以資「報復」，這時真令你啼笑不得，恨不得進去罵他們一頓。

總之，抗戰時期浙大學生的衣食住行，真是都一無是處，但大家都撐過去了，精神戰勝物質，這大約是成功的因素吧！

## 土包子。敢把那女學士追

有一次我在朋友家中宴會時，座中一位教會學校出身的朋友說：

「你們浙大學生呀，都是些土包子嘛！」

我當時大笑起來，我說：

「一點也不錯，你知道我曾是土包子隊長嗎？」

說起浙大學生，真可以說得是「土氣」之精英，大家都以此為榮。一個所謂洋腔洋調的學生，在那種環境之下，是難以立足的。記得有位同學名叫約翰X，是上海來的，我有兩個同鄉就是見不得他，專門拿他開頑笑，一見到他便說：

「嗨，約翰X，怎麼你頭髮是黑的？」

「喂，約翰X，這裏有瓶藍墨水，拿去將眼睛染下好不好？」

可憐約翰X，受盡欺侮！其實X同學我很熟悉，他為人忠厚，為學篤實，只可惜錯取了一個洋名字，受盡別人譏諷。

也許是當時風氣使然，尤其我們這一代的人，生於憂患，長於抗戰，滿腦子的國家主義，民族思想，在浙大形成了一種風氣。譬如有人與繳來了洋腔一下，早晨見到你時，說聲「Good

MORNING」馬上那人會反被遭受白眼。

「唉！吃中國飯，何必放洋屁？」

就這樣，凡是「洋氣」的人，受盡打擊。

但浙大不是義和團。浙大學生所不屑而為的是無端的「崇洋」、「媚外」。相反的，浙大所吸收的新知識不亞於任何學校，我們很多教科書都用原文，我所讀的課程當中有兩樣習題同試題全是英文。生物系有兩位印度學生，不諳中文。有時同學同他講英文，他聽不懂，於是又換一個人來講，這時，誰敢罵他們在放洋屁？浙大還有一位教德文的猶太籍女老師，當她拉着小狗在河邊散步時，從來無人過問她的黃頭髮和藍眼睛，都同她笑臉相迎。

你說「土」，那恐怕只是相對的，而非絕對的。抗戰時期的國立學校，恐怕大都如此。不過浙大，自有她的一套。

說浙大不注重英文倒未見得，但對土生土長的中文確是特別重視。史地系有一屆幹事，出通知時專用四六駢文，頗受大家欣賞。有位女同學同時收到兩封邀宴的帖子——一封是鋼筆寫的，說明日期地點，另一封是端正的毛筆字，最後寫着「恭候香車」，這位女同學把前者謝却了，理由是：「那麼歪歪倒倒的字，想必人也是那樣，誰高興同他們在一起玩？」這固然是成見，但也「土」得可愛。

女同學們的「土」，在浙大已相沿成習。不管她是誰家的千金小姐，不管她爸爸是什麼要人，一入浙大之門，藍布旗袍一穿，就澈頭澈尾的換了一個人。有幾位女同學櫃子裏都有漂亮衣

服和高跟鞋的，但她們平時絕對不肯穿，等到晚間無事時，有人提議：

「我們來打扮一下吧！」

於是幾個好朋友，嘻嘻哈哈的抹口紅穿新衣，在房間裏大過其癮。

有一次，我們好些女同學在房裏亂聊，討論人生大事，其中一個問題是：「你喜歡跟那一種人結婚？」在所有的同學當中，沒有一個人說：「我要跟有錢或有地位的人結婚。」或是「我要跟洋人結婚」。後來臨到我，我說：

「我要跟一個像古代勇士那樣會騎馬射箭的人結婚。」把她們逗得狂笑不已，都說：

「快去找個遊牧民族吧！」（天知道，我現在的丈夫連弓都不會拉，看到蛇就要跑。）

再說男同學，也都「土」得可愛。不說別的；問問他們當中當時有幾個人會跳舞？有幾個人會打領帶？有幾個人肯歪頭吹口哨？有幾個人能低頭用刀叉？但他們都不在乎，反說這些都是小事，這批人，說是「土包子」，誰曰不宜？

## 滿天星斗。一輪明月

浙大在黔北的三處校址，以湄潭的風景最為優美，那兒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，尤其是近湄江橋的那一帶，風光旖旎，真是黔北江南。一般校舍，除教室借用舊屋外，宿舍、飯廳都是新蓋的樓房，尤其是女生宿舍，傍山而築，一籬繞護，別有一番風致。

湄潭城很小，既非趕場中心，又非交通要道，平時異常安靜，同學在此，一無去處，除讀書

外，惟一的消遣就是散步，每當晚飯後，三五成羣，男一堆，女一堆，漫步湄江河邊，這真是大家碰面的一個大好時光，有些男同學，平時不顧到女生宿舍籬笆外站崗的，不願貿然去碰釘子的，都借這散步時間一睹芳容。經常在我們去散步時，一到湄江橋邊，就碰到某某同學，點頭打個招呼，繼續前進，結果走到江邊轉灣的地方，又碰到那位同學，於是再點頭打個招呼，誰知繞個大圈子走回女生宿舍時，在街上又碰到那位同學，又三點頭打個招呼，這樣一晚三會面，會面一點頭，這種會意而不言言的友誼，真是韻味深長，浙大多數男女同學，都具有此種情調。聽說有些膽小害羞的男同學，就乘此機會，大過其癮，一晚上繞湄江慢步，流連忘返，可達七八趟之多。不知確否？

湄潭的風氣還算開通，遵義就不同了。女生宿舍在楊柳街內，重門深院，不能直衝而入，男同學來訪時，首先必須經過傳達老趙，然後由老趙站後院大喊：

「某某某小姐，有客。」

會客室的窗子，緊對後樓宿舍，這一下，來者為誰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只有硬着頭皮等，等到了還好，有時只聽得一聲回答：

「某某人不在家。」倒霉！碰了一鼻子灰，垂頭喪氣的走出來。

有個時期，訓導處也似乎跟男同學為難，要來訪的人像填聯保單似的填上姓名，並說明訪問何人，然後由老趙拿條子去找人，這樣一來，無形中讓訓導處知道了，而且留個痕跡，於是有許

多男同學乘老趙走向後院找人時，伸手就把桌上那張存根撕掉，會客過後，走了，自以為無憑無據，未留任何痕跡，誰知老趙亦是精靈鬼，等人走後，他又神不知鬼不覺的把雙雙大名補上。後來聽說老趙不勝其煩，這制度也無形中取銷。

這些現象，實在是因為女同學人數太少之故，物以稀為貴，當然她們會神氣起來的。

園藝系有位女同學，小時因得過天花，不幸一目失明，滿臉皆麻，不知那位大手筆，送她一個綽號叫「滿天星斗，一輪明月」，（這綽號真絕！可謂信、雅、達皆備。）她在浙大時，曾收到過一封情書，還有一次有人約她月下相會。事隔多年，有人提起這件事時，還在感嘆的說：

「浙大男同學真差勁，連滿天星斗一輪明月這樣的『剩餘物資』都要人！」

其實不是差勁，是供不應求，才使女同學身價十倍。

有些女同學也真缺德，收到男同學信時，一不高興，就會原封退回，有些還公開示衆，有些又加上朱批，真令人吃不消。一位自命前進的男同學，善寫情書，自以為外國東西讀得多，要想大顯一番身手，滿紙托爾斯泰、莫泊桑等等的話，可惜他看錯了對象，這位女同學接信後，拿筆就批道：

「滿紙莫泊桑，令人心傷！」

四書五經未讀過，克魯泡特『經』空猖狂。

托爾斯泰原無礙，三蘇兩杜不可忘。

馬克斯，難欣賞，閒來最好讀老莊，

莫管人家多偉大，數典忘祖總荒唐。

嗟嗟乎，真冤枉！便抄首唐詩也風光。」  
這事做得確是謹而又虐，有點過份，但也可見當時的一般情況了。

## 「說是就是」、「賊骨頭哇」

在我剛進浙大不久之後，頭一次聽校長訓話時，我和很多同學都聽不懂他究竟在說些什麼，他聲音快而促，吱吱喳喳，有如百鳥歸林，腦子裏只記得他在臺上將雙腳跟向上「抬一抬」的，似乎好像老是有這麼幾句：

「賊骨頭哇，賊骨頭哇，我們浙大，說是就是……」

當時莫名其妙，後來時間久了，過了一年半載下來之後，才知道「賊骨頭哇」原來是校長的一句口頭禪「這個的話」的紹興腔，他每次演講時，要說三十到六十次之多的。「說是就是」，也是他的一句老不離口的浙大校訓：「實事求是」四字。就這樣，浙大學生四年下來之後，沒有一個腦子裏不深深印着「實事求是」這幾個字，遇事都要講真理，務本質，腳踏實地去做，以至終生。

人說浙大學生士氣，那真要歸功於「求是」精神的薰陶結果。在抗戰期中一個花花公子不肯為國捐獻的「猶太」，或是一個千嬌百媚功課不及格，常要補考的小姐，在浙大是永遠出不了頭的，我在一年級時，見到一位男同學，能說善道的，風頭極健，他常身穿黃皮夾克，（全校大約也只有見到一兩件吧！）黑皮鞋，整天的昂首闊步來

着書本走來走去，到二年級時不大碰到他了，到我們畢業那年，他的皮夾克舊了，頭低下來了，公共場合看不到他了，聽說他每學期都有一兩樣功課不及格要補考的。

說到功課，浙大一向以苦幹死拼為主，教授們對功課之逼緊，態度之認真，對分數之「扣門兒」，世上少見，在一年級昇到二年級的這個階段，很多人被刷出去了。其實像當時那樣的物質條件之下，很多同學連紙筆都買不起，仍能孜孜不倦，實在偉大。晚間，每人一盞油燈，三根燈草，就這樣，可以讀到夜深。人常說「家貧出孝子」，我却道「時艱造賢才」，今天，在國內，在國外，好些堅苦卓越的苦幹者，不都是浙大出身的嗎？

在學校時，我們不知程度高低，等到畢業後同別人一比，就覺得神氣了，譬如最後一屆公費出國留學人數，以全校人數和系別多少的比例而言，浙大可佔前一二名的，在國外讀書的，以本科而論，浙大學生比別的學校的便宜多了，在國內做事的，論學術、論技術，浙大也總是不落人後。

若說浙大學生都是死啃書，倒也未必。抗戰八年，浙大師生出錢、出力、流血、流汗，真不知做過多少可歌可泣的事！除了直接從軍的不算外，勞軍、義賣等活動，差不多每年都有，那時同學們是一身之外無長物，可是一有義賣，都照捐不誤。我在四年級時，有一次，同學又來向我捐東西舉行義賣，我身邊只剩下一塊祖傳的寶硯和兩錠墨，那硯臺小而輕，雕刻精細，是先曾祖

父中進士之後皇帝所賜的，這祖傳之寶隨着我越過千山萬水，帶到貴州，我當時一無所有，只得忍心把硯臺捐掉，可惜後來負責義賣的同學不識貨，訂價很低，給一位女同學買去了，至今我仍然很驕傲的對兒女說：「二次大戰時，我也有貢獻呢！」

在宜山，曾開過一幕滑稽劇，極有意思。那時有批同學去從軍沙場征戰，出生入死，後來日本人打來，把他們這批人沖散了，都狼狽逃回學校，檢點人數，少了一位姓戴的同學，派人到戰地去找，在亂屍堆裏發現了一位身穿黃制服（浙大校服）的年青人，尸體已腐爛不清，大家斷定一定戴同學已成仁了，很多人抱頭大哭，接着開追悼會，大家又歎歎一番。過了一年多之後有人說他似乎在街上看到戴同學，後來又有人說看到他，於是大家相繼宣告說戴同學鬼魂出現，到最後才知道是戴同學真人現形，他並未死。原來他被日本人捉去之後輾轉送到上海，後來又再偷回後方，仍到浙大復學，這場悲喜劇才告一結束。這也是抗戰期中浙大學生為國效力的一點小插曲。

三十三年底，為了響應總統號召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浙大立即有幾百人參加，後來因人數太多，還有人未能如願。

最感人的事蹟莫過於這年的勞軍了。那時日軍蠢動，進犯黔南、貴陽一帶吃緊，中央派遣大軍南下，道經遵義時，浙大學生以最大的熱情去慰勞歡送，使得軍心大振，勇往直前，日軍打得節節敗退，奠定了日後勝利之基。

那真是一幕感人的場面。當一輛輛的軍車載着大批戰士經過遵義車站時，浙大的學生瘋狂了，像潮水一般的衝到車旁，爭着向戰士們慰勞；握手、獻花、贈禮品，一面歡呼，一面高唱，那情景，震撼了每個士兵的心，只見他們熱淚盈眶，拉着同學們的手說：

「我們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！」

有一次落着大雨，很多戰士在車篷裏衣履盡濕，打傘的同學們看到了就蜂湧上去，將傘遞給他們，却忘了自己也身在雨中。這一下，贏得戰士高呼，喊着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，大家的臉上，也不知掛了多少淚水和雨水。事後有位高級將領說，這次軍心大振，把日本人打得節節敗退，浙大學生功不可滅。

抗戰最後是勝利了！這八年中，浙大學生受盡了艱難困苦，然而浙大也由此茁壯，成熟，而她那「實事求是」的精神，也將永留人間！

試

閱

贈與中外雜誌讀者的親戚、朋友、同學、試閱。請剪此券並附郵票五元，寫明收書人地址、姓名，由本社代寄本雜誌第五卷第一期再版本一冊。